

『信、似、译』

卞之琳的文学翻译思想与实践

李敏杰 著

Faithfulness, Similarity,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Bian Zhilin's

Literary Translatio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信、似、译』

卞之琳的文学翻译思想与实践

李敏杰 著

Faithfulness, Similarity,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Bian Zhilin's
Literary Translatio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信、似、译：卞之琳的文学翻译思想与实践/李敏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9

ISBN 978 - 7 - 5203 - 2947 - 7

I. ①信… II. ①李… III. ①文学翻译—文集 IV. ①I04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8064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责任校对 冯英爽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
插 页 2
字 数 312 千字
定 价 8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在我国现代新诗发展史上，卞之琳有着独特的地位。他身兼诗人、翻译家、莎学学者多重身份，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长期以来，人们更多研究其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较少关注其在翻译领域及莎学研究领域的成就。实际上，他不仅在文学翻译实践方面取得了杰出成绩，在文学翻译理论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卞之琳认为，文学翻译是艺术性翻译，要求译文从内容到形式全面忠实于原文。为再现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他提出以“信、似、译”为核心的翻译思想，实现了对传统译论的继承和超越，并在诗歌、戏剧、小说和散文等翻译活动中践行这些思想。同时，他的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文”“相长”关系，使其得以“融欧化古”，创作了独具特色的现代新诗。

本书绪论部分梳理国内外对卞之琳文学创作、文学翻译的相关研究现状，指出现有研究之不足，叙述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第一章是“信、似、译：卞之琳的文学翻译观”。卞之琳认为，文学翻译是一种“艺术性翻译”，应以“信”“似”“译”为要求，包括“全面的‘信’”“以形求神、形神兼备”“翻译而非创作”三方面。这一思想，体现了文学翻译的总体目标（“信”）、实践操作方式（“似”）和本质属性（“译”），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超越了传统译论中“信达雅”之辨、“形似、神似”之争、“直译、意译”之论，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

第二章是“诗歌翻译：卞之琳的翻译实践（一）”。为再现原诗的艺术价值，卞之琳提出具体的诗歌翻译主张：以诗译诗，格律译诗，保留原作



的艺术形式；格律相当，以顿代步，再现原作的艺术节奏；亦步亦趋，相应伸缩，追求最大化再现原作的艺术效果。在这些原则指导下，他的译作格律有致、节奏有序，以形见神，风格忠实原文，意象生动形象，实现了从内容到形式“全面的‘信’”。卞之琳不仅翻译外国诗歌，还将自己创作的部分诗译为英文。这些自译诗，未严格恪守其外国诗歌翻译主张，从而呈现不同的面貌，是诗人多重身份相互协调、相互妥协的结果。

第三章是“莎剧翻译：卞之琳的翻译实践（二）”。作为莎学专家，卞之琳主张深入研究、比较不同底本，以使译本接近原作，还原作品的艺术本貌；吸收莎学研究成果，使译本具有学术型翻译特点；形式方面“等行翻译、以诗译诗”“以顿代步”，最大程度保留原作诗体剧的形式与格律。在这些主张指导下，其莎剧译本重视个性化语言的运用，以诗体形式呈现原作风貌，注重意象和修辞格的翻译。

第四章为“小说、散文翻译：卞之琳的翻译实践（三）”。作为一名诗人翻译家，卞之琳对散文、小说的翻译提出要求：以译诗的要求来译。具体而言，他主张选择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进行翻译，认为译文应尽可能保留原文的形式，语言风格上与原文一致。他的这些主张，与其诗歌翻译、莎剧翻译一脉相承。在这些理论指导下，其译文以形传神、形神兼备，准确地再现原作的风格，达到了以“艺术的语言”再现原作“语言的艺术”之目的，成为文学翻译的佳品。

第五章为“卞之琳翻译与创作的相互影响”，探讨了卞之琳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关系。一方面，其文学翻译活动对其文学创作具有较全面、深入的影响，包括创作中的格调与诗风，象征与暗示、戏剧性处境、非个人化等写作技法的借用，意象的借鉴，诗体形式的试验，“欧化句法”的运用等方面。另一方面，其文学创作也影响其文学翻译活动，包括对所译作品艺术价值的重视，有意选择韵律等方面可资借鉴之作进行翻译，追求原作神韵的再现，以及翻译中的艺术性“再创作”。

最后为“结语”，对本研究进行归纳和总结，并指出研究的不足及可拓展方向。

目 录

绪 论	1
-----------	---

上篇 理论篇

第一章 信、似、译：卞之琳的文学翻译观	17
第一节 “信”——全面的“信”	18
第二节 “似”——以形求神，形神皆备	30
第三节 “译”——翻译而非创作	39
第四节 “信”“似”“译”之统一	47

中篇 实践篇

第二章 诗歌翻译：卞之琳的翻译实践（一）	53
第一节 卞之琳的诗歌翻译策略	54
第二节 卞之琳的诗歌翻译实践	72
第三节 诗歌自译——另一种面貌	89



第三章 莎剧翻译：卞之琳的翻译实践（二）	106
第一节 “还其艺术本貌”的莎剧翻译策略	110
第二节 追求艺术再现的莎剧翻译实践	128
第四章 小说、散文翻译：卞之琳的翻译实践（三）	148
第一节 “以译诗的要求来译”：卞之琳的散文、小说翻译观	149
第二节 卞之琳的小说、散文翻译实践	164
 下篇 翻译与创作	
第五章 卞之琳翻译与创作的相互影响	183
第一节 翻译对创作的影响	186
第二节 创作对翻译的影响	254
结 语	274
参考文献	276
后 记	295



实践的研究则冷清得多。

因此,系统研究卞之琳的翻译思想与翻译活动,探索卞之琳的翻译与创作之间相互影响关系,使学界更全面、深入地理解这位“诗人翻译家”的心路历程及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

20世纪30年代,卞之琳从翻译西方诗歌入手,逐渐走上了诗歌创作的道路。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活动,如两架并驾齐驱的马车,确立了其诗人和翻译家的双重身份。学界对卞之琳创作和翻译的研究,大体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为研究肇始期;第二阶段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研究陷入低潮;第三阶段自80年代初直至现在,研究进入成熟期,相关研究日益增多。

卞之琳研究的第一阶段,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卞之琳走上文坛不久。学界研究以其创作为主,兼及所受外来影响,较少论及其译作。

1930年11月,正在北京大学就读二年级的卞之琳以“林子”为笔名,翻译并发表爱尔兰诗人、剧作家沁孤(John Synge)的诗作《冬天》(Winter),标志着他正式走上译坛。次年1月,他的诗作《夜心里的街心》发表。^①由此可见,卞之琳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几乎同时起步。伴随卞之琳走上文坛,国内评论家很快便注意到这位青年诗人。陈梦家任主编《新月诗选》时,将卞之琳的诗《望》《黄昏》《魔鬼的夜歌》和《寒夜》四首收录入内。在诗集“序言”中,陈梦家评价卞之琳是一个“很有写诗才能的人”,认为他的诗“常常在平淡中出奇,像一盘沙子看不见底下包容的水量”^②。沈从文1931年4月写作《〈群鸦集〉附记》一文,高度评价这位踏入文坛不久的诗人,表扬他以平常文字表达平常人情感所体现的质朴美,

① 《夜心里的街心》并非卞之琳最早发表的诗歌,但一般被视为其正式登上诗坛之作。早在1926年,卞之琳就读海门启秀初中二年级,应上海《学生文艺丛刊》征集,以真名发表了三四首小诗。不过这些小诗只是学生习作,题材和手法都显稚嫩,卞之琳本人也早遗忘。如1926年发表、作者题名“海门启秀中学卞之琳”的《小诗》:“最可爱的那时: / 明月下, / 澄清的湖边, / 独自依着临水的阑干。 / 一我两影—— // 日历声的‘霍索’, / 钟声的‘滴搭’, / 是爱听的声响么? // 黄莺儿在窗外骂我糊涂, / 我在床上反恨黄莺儿惊醒我的好梦。 // 桃花片呀! / 你是送春的小船; / 你载满了春光, / 在水面荡漾不定的, / 想送他到那里去呢?”见卞之琳《小诗》,《学生文艺丛刊》1926年第3卷第5期,第14—15页。

② 陈梦家:《新月诗选》,新月书店1931年版,第9页。

认为卞之琳的诗有别于胡适、闻一多等人的诗作,“达到了一个另外的高点”^①。李健吾则最早发现卞之琳诗歌中的“现代性”。^②在《〈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和《答〈鱼目集〉作者》两篇长文中,他对卞之琳的诗作了高度评价,认为“从《尝试集》到现在,例如《鱼目集》,不过短短的年月,然而竟有一个绝然的距离”,称赞卞之琳为“少数的前线诗人”之一。^③朱自清认为《三秋草》是“一本波俏的小书”,认为卞之琳“观察世态颇仔细,有时极小的角落里,他也会追寻进去”,他“用现代人尖锐的眼”,展现“精微的道理”,他的诗作“每一行是一个境界,诗的境界”。他还赞赏卞之琳作诗的技巧,称其诗作“因为联想‘出奇’,所以比喻也用得别致”,“书里的比喻不但别致,有时还曲曲折折的”,诗歌中的意象“虽是跳得远,这念头和那念头在笔下还都清清楚楚。”^④

卞之琳的诗歌创作,也引起不少评论家的批判。20世纪30年代,“我国左翼文学形成了一股激流”^⑤。左翼文学要求文艺大众化、通俗化,要求

① 原文为:“但弃绝一切新旧词藻摒除一切新旧形式,把诗仍然安置到最先一时期文学革命的主张上,自由的而且用口语写时,写得居然极好,如今却有卞之琳这本新诗。……当我把诗的趣味,放在新诗最初提出那一个方向上去时,我以为之琳有几首诗,达到了一个另外的高点,使我觉得更欢喜了。运用平常的文字,写出平常人的情感,因为手段的高,写出难言的美。诗的艺术第一条件若说是文字的选择,之琳在这方面十分的细心,他知道选择‘适当’的文字,却刷去了那些‘空虚’的文字。他从语言里找节奏,却不从长短里找节奏,他明白诗的成立以及存在,不是靠到一件华丽的外衣,他很谨慎,不让他的诗表面过于美丽。从作品上得到一种契合无间的同感,一笔两笔,风格朴质而且诚实,又并不因文字单纯简略转入晦滞,读集中的《奈何》,读《群鸦》,读《垂死》,皆能酝酿一种淡淡寂寞,这寂寞是青年人各有一分,自己却说不出,读时要忘却也无不忘却的。好的诗不是供给我们一串动人悦耳的字句了事,它不拘用单纯到什么样子的形式,都能给我们心上一点光明。它们常常用另外一种诗意保留到我们的印象里,那不仅仅是音律,那不仅仅是节奏。怎么美,怎么好,不是使我们容易上口背诵得出,却是使我们心上觉得那‘说得对’。我们对一幅画,一角风景,一声歌,一个标致美人的眉目口鼻过后所保留印象,大致也是只觉得那‘很合式’,却说不出那美的。之琳的诗在我的印象上,便有这种力量。”此文最早发表于1931年5月1日南京《创作月刊》创刊号。参见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0页。

② 李健吾曾这样评价:“他(指何其芳——引者注)缺乏卞之琳先生的现代性,缺乏李广田先生的朴实,而在气质上,却更其纯粹,更是诗的,更其近于十九世纪初叶。”参见李健吾《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7页。

③ 李健吾这样对比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等年轻的诗人:“这群年轻人站住了,立稳了,承受以往过去的事业(光荣的创始者,却不就是光荣的创造者),潜心于感觉酝酿和制作。……他们没有时光等待,他们的生命具有火热的情绪,他们的灵魂具有清醒的理智,而想象做成诗的纯粹。他们不求共同,回到各自的内在,谛听人生谐和的旋律。拙于辞令,耻于交际,他们藏在各自的字句,体会灵魂最后的挣扎。他们无所活动,杂在社会的色相,观感人性的无常。”参见李健吾《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7—88页。

④ 朱自清:《秋草清华》,延边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0页。

⑤ 卞之琳:《〈雕虫纪历(1930—1958)〉自序》,《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第222页。



文学服务于社会斗争需求，强调对社会黑暗的暴露和批判，突出文学的工具性和阶级性。卞之琳含蓄、隐晦的诗作，显然不合当时的时代潮流。左翼诗人蒲风评论《三秋草》时，把卞之琳归入新月派，并给他扣上“格律派”“唯美主义”的帽子。一位署名李磊的青年作者写了《〈鱼目集〉和〈孤帆的诗〉》一文，将《鱼目集》与左翼诗人孤帆的诗集《孤帆的诗》对照，认为《孤帆的诗》从正面反映底层人民的痛苦，而《鱼目集》则充满“幻想”“色相”“睡眼朦胧”“孤独”“灰心”“暮色苍茫”“孤泪”等字眼，发出的只是“有微毒的叹息”，实际上否定了《鱼目集》的价值。^①应当说，这些评论指出了卞之琳和其他现代派诗人与时代“疏远”的不足，但也忽视了他们关注现实、关注人生的一面，因而对其艺术价值和艺术意义缺乏公允的评价。史美钧认为，“新月系后期与陈梦家分秋色，而有灿烂光芒的，惟有卞之琳氏。虽然他的诗篇也见瑕疵并未达到完成的境界，可是仅是短期的努力而技巧纯熟，实比同时代的诸诗人已强得多了”，同时也批评卞之琳与社会现实脱离。^②

卞之琳的诗歌创作也遭到胡适、梁实秋等人的否定。胡适批判“少年的新诗人”创作的诗歌“叫人看不懂”，他们不懂“平实”“含蓄”“淡远”的境界，创作的诗是“看不懂而必须注解的诗，都不是好诗，只是笨谜而已”^③。梁实秋批判卞之琳等人的新诗“日趋于晦涩”，原因在于“精神生活太贫乏”，认为“这是一种堕落的文学风气”，将导致新诗“走向一条窘迫的路上去”。他提倡“诗人也得说人话”，而“人话以明白清楚为第一要义”^④。

评论家在评价卞之琳诗作风格的同时，也注意其所受外来影响。穆旦认为，在现代西方诗坛，艾略特带来的“以机智（wit）来写诗的风气就特别盛行起来”，“诗人们并没有什么可以加速自己血液的激荡，自然不得不

① 李磊：《〈鱼目集〉和〈孤帆的诗〉》，王训昭选编《一代诗风：中国诗歌会作品及评论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66—469页。

② 原文为：“卞氏的思想平淡，且是浸透了闲情的平淡，不否定现实也不与现实同流，对现实乃是游移不关心的逃避态度。他在自己的高楼中，飞跃自己情调的遐思，他缺乏客观社会描写，成了自己的主观的风格。……他对世界仅是单纯的臆测，人生观是消遣性的有闲的感兴。他描写一个闲人，叉着手在街路边蹈着柔软的沙尘，印着各色的足印，手里还轧轧地磨着两颗滑亮的小核桃，十分真切。多么悠闲的姿态，不妨说是他自己的写照。”参见史美钧《衍华集》，现代社1948年版，第66—67页。

③ 胡适：《尝试后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1—68页。

④ 梁实秋：《我也谈谈“胡适之体”的诗》，《自由评论》1936年第12期，第24页。

以锋利的机智，在一片‘荒原’上苦苦地垦殖”，而“把同样的种子移植到中国来，第一个值得提起的，自然就是《鱼目集》的作者卞之琳先生。”他肯定了《鱼目集》的文学价值，认为“自五四以来的抒情成分，到《鱼目集》作者的手下才真正消失了”^①。同为“汉园三诗人”之一的李广田，分析了《十年诗草》的“章法与句法”“格式与韵法”“用字与想象”等内容，肯定了卞之琳诗作中“那些多变的形式，那些新鲜的表现方法”。他提到卞之琳诗歌中“Wit - image”（智性化意象），评论客观、准确。^②袁可嘉认为，卞之琳诗艺的成功之处“全在感情借感觉而得淋漓渗透！”^③他还针对冯至、卞之琳等人诗作最为人诟病的“晦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现代诗中晦涩的存在，一方面有它社会的，时代的意义，一方面也确有特殊的艺术价值。”^④

这一阶段学界较多论及卞之琳的诗作，对其同样取得重要成就的领域——文学翻译则评论较少。较少聊胜于无。最早注意卞之琳文学翻译的是徐志摩，他甚赞卞之琳所译英国作家哈代（Thomas Hardy）作品《倦行人》（*Weary Walker*），认为卞氏“译诗极佳”，自承“哈代一诗我亦曾译过，但，弟译高明得多”^⑤。

在海外，早在30年代卞之琳开始诗歌创作时，其诗作便引起了学界的注意。1936年，青年学者陈世骧与英裔意大利作家、学者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合作，编译了《中国现代诗选》^⑥，选录郭沫若、徐志摩、陈梦家、冯至、卞之琳等15位中国现代诗人96首诗，包括卞之琳的诗作14首，由英国伦敦达克沃斯（Duckworth）公司出版，“是为首次向西方读

① 穆旦：《〈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大公报·综合》（香港版）1940年4月28日第8版。

② 李广田：《李广田文集》（第三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2页。

③ 袁可嘉如是评价卞诗：“卞诗确从感觉出发，却不止于感觉；他的感情的主调，虽极纤细柔弱，但常有辽阔的宽度及幽冥的深度，而他的诗艺最成功处确不在零碎枝节的意象，文字，节奏的优美表现，而全在感情借感觉而得淋漓渗透！这种情绪渗透原不是卞氏的独创，而为中外古今动人诗篇所共有，只是他凭借感觉成分特多而成为作品特色。”参见袁可嘉《诗与主题》，《大公报·文学副刊》1947年1月21日版，转引自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71页。

④ 袁可嘉：《诗与晦涩》，《益世报·文学周刊》1946年11月30日，转引自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00页。

⑤ 徐志摩：《徐志摩全集》（第六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⑥ Acton, Harold & Ch'en Shih - hsiang, ed. and trans, *Modern Chinese Poetry*, London: Duckworth, 1936.



者介绍中国新诗”^①。同年10月，日本《面包》杂志收入矢原礼太郎日译卞之琳诗三首，包括《归》《航海》和《断章》。1947年，英国作家罗伯特·白英（Robert Payne）编选了《当代中国诗选》。该书共收录徐志摩、何其芳、卞之琳等9名诗人113首诗的英译，其中卞之琳诗作16首。就数量而言，卞之琳的诗收入最多，且均由卞之琳本人翻译。诗后另附卞之琳本人为《距离的组织》《音尘》《鱼化石》《旧元夜遐思》《雨同我》五首诗作的注释（亦由卞之琳本人翻译）。白英的汉语水平有限，无法体味汉语诗歌的精妙之处，只能通过译文得出印象。在该书“导言”中他评价道，“有时觉得艾青遵循中国传统诗歌潮流，而卞之琳更像活在现代的唐朝人”。他认为卞之琳“有独特的声音，这和他读过的外国作品没什么关系，几乎只关涉中国传统”^②。这样的评论显然欠准确，卞之琳的诗歌的确带有中国传统诗歌（尤其是晚唐诗）的烙印，但他的诗作更受西方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影响。

卞之琳研究第二阶段，自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这一时期，卞之琳出版了诗集《翻一个浪头》，发表了《十三陵水库工地杂诗》等诗作。不过，总体上看，由于复杂的政治环境，加之其诗作被批为“晦涩”，卞之琳“在国内外受到毫无道理的忽视”^③，相关研究陷入低潮。这一时期，卞之琳把主要精力放在莎剧研究与莎剧翻译方面，出版了《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悲剧》等译作。

由于当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学界对其创作和翻译的研究、评论也寥寥无几。1956年，卞译《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悲剧》出版后，巫宁坤撰写评论，将卞译本与朱生豪译本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卞译本从内容到形式最大限度忠实于原文，而朱生豪以散文体形式翻译，改变了原文的诗体形式，导致读者对原文认知上的偏差。^④这篇论文运用翔实的资料进行分析，首开卞之琳翻译研究之先河。巫宁坤的这篇论文，是卞之琳研究第二阶段的重要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阶段卞之琳研究在国内陷入低潮，但在海外及港

① 陈子善：《本书说明》，陈世骧《陈世骧文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② Payne, Robert,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 1947, pp. 26, 30.

③ 张曼仪：《卞之琳著译研究》，香港大学中文系1989年版，第2页。

④ 巫宁坤：《卞之琳译〈哈姆雷特〉》，《西方语文》1957年第1期，第115—119页。



台地区，人们对其研究兴趣未减。卞之琳在海外和港台地区拥有不少读者，学者们也纷纷撰写文章、发表评论，评价其文学创作与翻译。

1963年，旅美学者许芥昱（Hsu Kai-yu）编选《20世纪中国诗》^①，总结了新诗自诞生以来至1963年的成就，并将诗人以流派划分。该书将卞之琳、冯至归为玄学派。赵毅衡高度赞扬许芥昱这一安排，认为：“卞之琳30年代中期，他最成功的诗作，除了明显的中国传统（尤其是婉约词派姜夔词的清绮娟秀），对接的是他所称的‘艾略特诗路’……许芥昱的现代中国诗集，单列冯至与卞先生为‘玄学派’，目光如炬。”^②1976年，梁增浩发表《抽象诗和卞之琳的“圆宝盒”》一文，指出卞之琳受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注重感觉和想象”，并分析了卞诗“抽象（形上）诗的特性”，比较了卞之琳与叶慈、艾略特、约翰·多恩、马英等人的意象运用。^③1978年，古苍梧发表《诗人卞之琳谈诗与翻译》一文，以访谈稿的形式探讨卞之琳的诗歌创作和翻译，重点探讨了英诗汉译的格律、音韵问题。^④

卞之琳研究的第三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是为卞之琳研究的成熟期。

80年代，改革开放带来国内政治、文化格局上的变化。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使卞之琳研究逐渐复苏，并在90年代达到高峰，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与学术著作。围绕卞之琳的诗歌创作、诗歌理论、中西文学影响、文学翻译思想与实践、莎剧研究等方面，相关研究全面展开。

就数量而言，这些研究以散篇论文为主。学界除承接前期卞之琳诗歌艺术研究外，对卞之琳的翻译主张、翻译实践（尤其是卞译《哈姆雷特》）产生了更大的兴趣。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三方面：

（1）诗歌技巧及诗歌精神：艾岩（1986）、周棉（1986）、孙玉石（1989）、蓝棣之（1990）、黄维樑（1992）、高恒文（1997）、汪云霞（2014）等对卞之琳的《断章》《无题》《鱼化石》等诗作进行文本解读，探析卞之琳诗歌的技巧与内涵；张桃洲（2002）、王光明（2004）、龙清涛（2004）探讨了卞之琳等现代诗人的新诗格律探索；王泽龙（1996）讨论了

① Hsu Kai-yu,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oetry: An Anthology*,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63,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② 赵毅衡：《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记》，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72页。

③ 梁增浩：《抽象诗和卞之琳的“圆宝盒”》，《诗风》（香港）1976年第46期，第3页。

④ 古苍梧：《诗人卞之琳谈诗与翻译》，《中国翻译》编辑部编《诗词翻译的艺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28—142页。



卞之琳的新型智慧诗特点；罗振亚（2000）探讨了卞诗“反传统”的艺术新质；王毅（2001）、罗小凤（2013，2015）、王泽龙、王晨晨（2013）探讨了卞之琳对中国古典艺术精神的执着；胡辉杰、汪云霞（2004）探讨了卞之琳、冯至、穆旦等现代诗人在50年代的身份焦虑；张林杰（2012）探讨了卞之琳北平时期诗作的复杂色彩；陈卫（2010）探讨了卞之琳30年代诗歌的含混策略；高博涵（2014）探讨了卞之琳1930—1934年间的创作心态；卢锦淑（2015）以“水”意象为题，探讨卞之琳诗歌中体现的儒、道、佛传统思想；

（2）卞诗所受西方诗学影响：李怡（1994）、萧映（1998）、江弱水（2000）、王泽龙（2004，2006）、贺昌盛（2004）、陈希、何海巍（2005）等探讨了卞之琳所受象征主义影响；袁可嘉（1992）、朱徽（1997）、张洁宇（2000）、曹万生（2007）、奚密（2008）、张松建（2014）讨论了卞之琳受艾略特等现代派的影响；刘东（2008）讨论了纪德对卞之琳的影响；王家新（2011）讨论了卞之琳、穆旦等人通过翻译奥登诗而推进现代新诗发展；陈世杰（1999）、北塔（2000）、许霆（2010）等探讨了卞之琳对西方十四行体的移植；王攸欣（2015）从中西诗学的总体视野出发，探讨卞诗的艺术精神和诗学传统；

（3）诗歌翻译及莎剧翻译：孙致礼（1996）、陈本益（1996）、孟宪忠（2001）、蓝仁哲（2005）、许宏、王英姿（2010）、张军（2014）、陈国华、段素萍（2016）探讨了卞之琳“亦步亦趋”“以顿代步”的翻译思想与翻译实践；黄觉（2011）从文化翻译角度对比梁实秋、卞之琳的《哈姆雷特》译本；北塔（2006）探讨了卞之琳诗歌的英文自译；汤金霞、梅阳春（2013）探讨了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对传统译论的传承与超越；肖曼琼（2011）讨论了卞之琳诗歌翻译中的白话格律体形式及对音乐美、“本色美”的再现；朱宾忠（2007）讨论卞之琳的翻译与诗歌创作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关系；肖曼琼（2012）探讨了卞之琳诗歌创作和翻译之间“情与理”的协调互补关系。

1990年，为庆祝卞之琳八十华诞，袁可嘉、杜运燮、巫宁坤等主编《卞之琳与诗艺术》论文集。文集收录论文23篇，全面、系统分析了卞之琳在诗歌创作、诗歌翻译、莎剧翻译、文学批评等方面的贡献，并围绕其创作和翻译开展理论探讨。1998年，陈丙莹出版《卞之琳评传》，论述了卞之琳的诗歌创作、理论研究和翻译。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专辟一章（第



六章)“翻译工作的辉煌成就”,较系统地介绍了卞之琳的翻译理论、译作的类型,并评价部分译作。2000年,江弱水以其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出版《卞之琳诗艺研究》一书,从意象、句法、肌理、格律和声韵等方面,系统研究卞之琳的新诗创作,并探讨西方现代作家、中国古代诗人和同时代师友对其产生的影响。^①2002年,海门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主编的《卞之琳纪念文集》出版。2007年,刘祥安的《卞之琳:在混乱中寻求秩序》出版,作者在中外文学相互影响的视野中,讨论卞之琳对国外诗路的借鉴和对传统词学的继承,评述卞之琳对“秩序”的不懈追求。^②

随着卞之琳诗作和译作的大量印刷,中外文学、文化的交往日益密切,海外更多学者开始研究卞之琳。1983年,荷兰学者汉乐逸(Lloyd Haft)以其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出版《卞之琳:中国现代诗研究》一书。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专门研究卞之琳诗歌作品的著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该书全面论述了卞之琳的诗歌创作、诗歌理论、所受外来影响、文学翻译等,既有历史的阐述,也有文本的分析。作者认为,“卞之琳创造性地将西方和中国元素结合在一起,成为20世纪中国诗坛最持久、最有特点的歌喉之一”^③。作者系统研究卞之琳的创作和翻译活动,得出结论:“(1)纵观其生,卞之琳更乐意把诗歌看作一种艺术形式(art form),一种对技巧要求很高的技术(或职业),而非表现具体感受和观念的手段;(2)对其影响最大的是法国象征派诗人;(3)卞之琳的诗歌才能,最见于其免受政治压力那段时期,具体而言,就是1930到1937年之间。”^④

1983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Christine M. Liao撰写博士论文,对比研究卞之琳与艾青的诗歌创作。^⑤1985年,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Bonnie S. Mc Dougall)发表书评,从卞之琳与政治的关系出发分析其被忽视:他既不迎合,也不反对政治。^⑥1992年,叶维廉编选并翻译的诗集《防空洞里

① 江弱水:《卞之琳诗艺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刘祥安:《卞之琳:在混乱中寻求秩序》,天津出版社2007年版。

③ Haft, Lloyd, *Pien Chih - lin, A Study in Modern Chinese Poetry*, Dordrecht, Holland, and Cinnaminson, N. J.: Foris Publications, 1983, p. 1.

④ Ibid., pp. 2 - 3.

⑤ Christine M. Liao, *Bian Zhilin and Ai Qing: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Reference to Topic and Cohesion*,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1982.

⑥ Bonnie S. Mc Dougall, “Pien Chih - lin: A Study in Modern Chinese Poetry by Lloyd Haft”,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o. 2, 1985, p. 269.



的抒情诗：1930—1950 中国现代诗选》^① 出版，选取了艾青、臧克家、卞之琳、冯至等 18 位诗人的作品。1997 年，美国华盛顿大学 Woo - kwang Jung 撰写博士论文，讨论了汉园三诗人，其中第二章以“卞之琳的诗作”为题，从“内在的节拍——顿”“戏剧化描写和跨行技巧”“主题与鲜明的意象”等方面探讨了卞之琳《汉园集·数行集》的诗歌艺术。^②

在港台地区，相较前两个阶段，更多的学者对卞之琳诗作和翻译展开研究，发表了许多独到、深刻的见解。

这一时期为卞之琳研究做出最大贡献的港台学者，当属香港大学张曼仪。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张曼仪便醉心于研究卞之琳的创作与翻译。70 年代，她开始着手卞之琳专题研究，收集大量珍贵研究材料。1989 年，她历时 8 载完成《卞之琳著译研究》这一著作。这是最早的卞之琳中文研究专著，具有“拓荒”的意义。该书材料丰富，传、论结合，系统研究了卞之琳的创作和翻译，对卞之琳进行了较全面的、高水平的总结，显示了著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单辟一章“创造与再创造——翻译的理论和实践”，专门探讨卞之琳的翻译观点和翻译实践，“注意前人没有注意过的翻译上的成就，使卞之琳既能以著名诗人又能以莎剧翻译家的身份进入文学史”^③，为卞之琳研究尤其是翻译研究向前迈进做出了重要贡献。书后还附有“卞之琳著译书目”“卞之琳新诗系年”“卞之琳生平著译年表”等，为卞之琳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其他不少港台学者也通过发表论文、评论的形式，发表他们的见解。1980 年 2 月，香港《八方文艺丛刊》第 2 辑出版“卞之琳专辑”，汇总了张曼仪、黄维樑等学者的论文。张曼仪认为，卞之琳作品之所以有“持续的影响”，重要原因是诗人“在写诗的基本功夫上掌握到‘戏剧化地描绘一个场面’和‘灵活地运用口语’这两种能力”^④。黄维樑对《一个和尚》《酸梅汤》等作品逐一进行评析，探讨了卞之琳的“诗艺”。^⑤

① Yip, Wailim, *Lyrics from Shelters: Modern Chinese Poetry, 1930 - 1950*,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2.

② Woo - kwang Jung, *A Study of "The Han Garden Collection": New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Poetry, 1930 - 1934*,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97.

③ 古远清：《评张曼仪的〈卞之琳著译研究〉》，《诗探索》1997 年第 3 期，第 167 页。

④ 张曼仪：《〈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试论卞之琳早期新诗（1930—1937）》，《八方文艺丛刊》（香港）1980 年第 2 期，第 155 页。

⑤ 黄维樑：《雕虫精品——卞之琳诗选析》，《八方文艺丛刊》（香港）1980 年第 2 期，第 187 页。



卞之琳也在这一期上发表了两篇诗作和论文《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的汉语翻译及其改编电影的汉语配音》。1981年，木令耆发表《〈湖光诗色〉——寄怀卞之琳》一文，评价卞之琳诗作：“他和梵乐里（即瓦雷里——引者注），不爱用诗来写诗人的灵感活动；但还和梵乐里在构思严谨上相同。这种极度严谨的构思在卞之琳的诗里，便表现为雕塑似的，织锦似的形象和语言的安排。……卞之琳的诗虽然常有水的清澈和流动，却是在思想境界上，文字音律上，精雕细琢极有层次，极有组织的诗。”^①

1990年，香港《诗双月刊》第5期出版“卞之琳特辑”，发表卞之琳、唐湜、杜运燮、袁可嘉等人的诗文及周兆祥、张曼仪、江弱水、陈德锦等人的评论。周兆祥以《哈姆雷特》为例，对比了卞之琳、梁实秋和曹未风三人的译本，从“以诗译诗”“无韵诗的处理”“意象的处理”“双关语的处理”等方面对比分析，认为卞之琳使用格律体翻译的莎剧，“成就超出其他译本的平均水平很多”^②。张曼仪梳理了卞之琳的创作历程，认为卞“出于‘新月’而入于‘现代’，却又自成一家，在汉语的特点和传统诗歌的基础上汲取法国象征主义技法，成为我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先行者”^③。江弱水论证了卞之琳诗歌“由实入虚、虚实相生的那份亲切与空灵”^④所蕴含的古典主义精神。陈德锦认为，卞之琳“借鉴西洋诗歌格律，复受现代主义的无我观及客体投射的启示，再糅合中国传统抒情诗的意趣和乡土感性”，通过诗歌“把有距离的事物组织起来”。^⑤

随着卞之琳作品艺术价值越来越多地得到认可，海外和港台地区的学者还对卞之琳的作品进行翻译。1992年，奚密（Michelle Yeh）选编《中国现代诗选》（*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一书，收入《古镇的梦》

① 木令耆：《〈湖光诗色〉——寄怀卞之琳》，《八方文艺丛刊》（香港）1981年第4期，第100页。

② 周兆祥：《诗人传诗剧——卞之琳译〈哈姆雷特〉赏析》，《诗双月刊》（香港）1990年第5期，第23页。

③ 张曼仪：《卞之琳论——〈卞之琳《中国现代作家选集》〉编后》，《诗双月刊》（香港）1990年第5期，第37页。

④ 江弱水：《一缕凄凉的古香——论卞之琳诗中的古典主义精神》，《诗双月刊》（香港）1990年第5期，第26页。

⑤ 陈德锦：《卞之琳抒情诗的距离和组织》，《诗双月刊》（香港）1990年第5期，第41—47页。